

宋益清著

十年報人

李璜題



十年報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宋 益 清

發行人：李 公 權

發行所：青 城 出 版 社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公園大樓五〇五室

電話：三一四一〇五七

臺北郵政劃撥：一一〇七八二

印刷所：協 林 印 書 館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

電話：三三一九一七二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字第 一四六七號

目錄

序		四
從讀報到辦報		九
新中國日報遷川出版		一五
報紙的編輯、印刷和業務		二七
斥和平運動		三九
新聞自由與戰時新聞檢查		四九
我們的言論態度		五九
報紙言論		六九

星期論文、專論、專欄和副刊·····	八三
德蘇啓戰及珍珠港偷襲·····	九五
一段「外交」往事·····	一〇三
勝利之月·····	一〇九
政協時期的新中國日報特刊·····	一二九
言論報國七週年·····	一四一
題外文章·····	一四九
報人的信條·····	一五五
彈 痕·····	一六一
新中國日報的姊妹報——中華時報·····	一六五
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一七三
「第四階級」的威力·····	一七九

附 錄

中國報業發展與報業行政（附原刊英譯文）

.....一八三

目 錄

三

序 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上旬，我自臺北動身訪美，一到紐約甘迺廸機場，周謙冲兄來接，見面第一句話就說：『「十年報人」今天才到美國訪問。』『「十年報人」是我平常引以自況，也是我自己要記這一段生活的一個題目。謙冲兄此語，一則是說「十年報人」今天才來訪問以新聞自由傲世的美國，一則是責問我自許的「十年報人」的回憶記述何以現在還不出來？就在這頃刻之間，我們共同回憶在抗戰八年間，爲「新中國日報」艱苦奮鬥；戰爭勝利了，好像志猶未盡，興尚未了，不事喘息，謙冲兄先去上海同左舜生先生創辦「中華時報」，而後由我接上去把這新辦報紙的責任負起來。因之拿我個人來說，前後辦這兩個報紙整整十年，往事歷歷，記憶尚新，在異國與有關兩報的老朋友相逢，感慨萬千！

大陸淪陷廿八年，故國、故事、故人之思，無時或已，而且激切之情，與時俱增。回憶往事，因而產生憂國、敬事、懷人之思，又因而想起這十年辦報生涯。而且這一段往事的追記，在長久的想像中已經給予一個題目叫着「十年報人」了。

前說「往事歷歷、記憶尚新」，那是一回事；而要把它記下來寫成文字，記事如當時之實，記人洽當時之情，卅年爲期的一代已成過去，所能記起憶及的，則又是一回事了。因之，要寫這「新中國日報」八年和「中華時報」二年的過去，則非手下有這兩報的存本莫辦。

在這裏我很感佩周開慶兄之廣於瀏覽，重視報刊歷史資料。他在十年前就在臺中國史資料蒐藏中，發現成都「新中國日報」合訂本，而且把所見合訂本的年月開給我。計廿八年四、五、九、十一、十二月各一本；廿九年一、二月、五至十二月各一本；卅年全年十二本；卅一年六月、十二月合訂爲一本；卅二年及卅三年全年各十二本；卅四年一至八月各一本；卅五年四至八月各一本。因爲從臺北到臺中還遠，要去翻閱，須在當地留住十數日或數週，過了很久，我都沒有去閱讀。直到一九七〇年後，國史資料已從臺中搬到臺北縣青潭銀河洞「近代史資料中心」，而我又移家於靠近清潭的中央新村，

我才於一九七四年初夏，到「資料中心」去借閱該報合訂存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邊翻邊作抄記，整篇記載或文章，則請人專抄，因該中心可代辦的複印不甚清楚也。如是我花去半年的時間，當然有時間斷，有時去半日，而全日則必須自帶食物，中午充饑。

在我閱讀期間，發現有的合訂本經人借出，再過一些時，又才還轉來。同時我在所閱的合訂本中，發現夾有紙條，紙條上或說明須複印的篇頁，或用各種顏色筆勾劃有符號，間或還有英文批記。這證明查閱這個報紙者大有人在，而讀者羣中也包括外國學人或學生，他們搜集我們一般人意想不到的素材和資料。

過去某個時代的報刊，等到數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其一片一紙，一條消息，一段文章，一篇報導，都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們可能代表當時一個觀念，一個理論；一點共同的認定，一件矛盾的事實；一樁民間禮俗，一種官定制度；社會動態，經濟榮枯，政治理亂……都可從上面揭露出來。似此情形，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相距的時間愈長，其價值可能愈大。我們辛苦的使得一份報刊問世，其對人類、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即已連帶產生，而且這價值有的是與時俱增的，祇要對於這一工作是忠實、認真和負責的。

再者，有以讀者的多寡來衡量報刊的價值，這又不然。譬如倫敦泰晤士報和紐約時

報的讀者，比之同地並世的某些報紙讀者相去很遠，你能說前兩聞名世界的報紙在價值上遜於他報嗎？至於後世讀者，溯代而上，在報刊找資料，其腦子中更不計當時該報刊之銷量也。自古以來，書報讀者中，碰巧有一個於讀後得其精義，獲致啓示，則該書報價值卽已證明，而其作者亦可自慰矣。在學術思想史上有一顯明、趣味的例子：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卽自認他的自然權利理論，得自一六八九年英哲洛克所出版的「民治論」一書（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此後美國民治理論和制度的發展則又得自傑佛遜之民主理論了。

我接辦的這兩個報紙，都是創刊自左舜生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有關這兩報創刊的經過爲：

我們因爲得着一位湖北同志穆子斌的贊助，慨然把他的一套印報機件借了出來，因而我們在漢口有「新中國日報」的創刊。這個報是我經手籌備的，出版後我還任了二十七天的經理，然後交給一位四川同志宋澍波（益清）接辦，後來這個報遷往成都，一直支持到這次退出大陸才告結束。在最近二十年中，我一共爲青年黨創辦過三種日報：一、申江日報，款是廣東的同志籌的，事是我做的，在上海出版，

整整辦了半年，錢完了，報停了，我也病倒了。二、就是上面所說的新中國日報。三、中華時報，勝利後在上海出版，我辦了一年多，依然交宋同志接辦，一直維持到這次上海淪陷前始告停刊。

舜生先生接着又說：「根據我這三次辦報的經驗，知道在人才與經濟兩方面沒有充分的把握，確不容易支持，一切條件不如人，單靠拿人去拚命，所得的最多不過是一種失敗的經驗而已。」舜生先生一生，就是以言論報國，辦過不少的刊物，也辦過三個報紙，結果流亡海隅，想到過去辦報的前塵，發此感慨，凡此中人，及非此中人而了解此中苦況者，皆有同感。可以這麼說，民國以來，所有政治報紙，尤其是政治報紙之屬於在野政治團體者，無不與舜生先生之「申江日報」為同一類型，亦無不與「申江日報」同其命運。

再有不否認者，舜生先生所從事者為自由新聞，自由新聞却要產生和存在於新聞自由的環境，然而這三個報紙都是在報人要求更多的新聞自由，讀者反而漠視自由新聞的環境中苦鬭，因而所說的三個報紙，一個夭折，其他兩個辛苦支持到一個絕對獨裁權力到臨之前關閉。

舜生先生謂其一生辦報爲「失敗」，自歎不如他人，乃是他虛懷之處。「失敗」爲無價值之自評，但從上述報刊出版即產生價值，有人讀之即能產生效力的論點觀之，舜生先生辦報的成效是有的，其價值是不可磨滅的，亦即是成功的。何況這三個報紙前後都有李（璜）、左（舜生）、常（燕生）、何（魯之）、余（家菊）、陳（啓天）等譚國士之文章，力透紙背，擲地有聲呢？

我們要感謝「近代史資料中心」把這許多「新中國日報」合訂本（雖然並不完整，祇有該報已出版的半數）蒐藏起來，留供後來的讀者。

去年十一月我和內人童俊屏女士（新中國日報社同人之一）從美國東岸返國途間，特訪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發現該館妥善保存有一張民國廿九年「五四」紀念日出版的「新中國日報」。

有如此重視報刊資料的資料中心和大學圖書館，我們從任何艱辛中過來的新聞工作者，更有何話說呢？（現在這類資料在美國已經製成膠捲，永久保存了。）

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任何的艱辛歷程也不值得重視，可是這十年的前八年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存亡絕續的八年，當時民族的集體與個人祇知道團結一心，將所有、所

能貢獻於國家，以期如何贏得戰爭；後兩年是在清掃戰場（廣義的），整頓內部，如何去掉戰爭後遺的否定因素，發揮因戰爭而顯示的肯定因素，以開拓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前途而贏得和平。這十年是國家民族繼往開來，歷史關鍵的十年。作爲一個報人，記述這十年間任何有關的大小「挑戰與回應」，都是有價值於來茲的。

當然，我之記述「十年報人」往事，純然出自憂國、敬事、懷人之一念，乃爲自感、內省之至情，初無意語於報刊之價值問題也。

從讀報到辦報

民國十一年，由先我一年前去北京的龔從民兄經常郵寄了一份英文報紙叫着北京快報（Peking Express）給我，這是我繼續不斷讀報的開始。北京快報是一個四開單張的報紙，專為比較高年級的中學生讀的，整個版面都是英文，祇是經常在新聞中的地名和人名之後附註中文原名。不用說讀這樣報紙的青年目的在練習英文，我也不是例外，可是我却因此而對新聞時事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民國十三年暑期我到北京，住在四川會館，讀書在中國大學，無論是在學校或會館，總以能夠讀到陳博生先生主辦的晨報（後改爲新晨報）和邵飄萍先生主辦的京報爲快。十四年夏間我考入清華大學，學校圖書館的地下室有一間很大而各種報紙都很齊備的閱報室，但是我仍然要自訂三種報紙讓報販送到我的寢室裏，那是北京的晨報、天津的

大公報、和英文的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在學生時代的我，每個月有三種報的經濟負擔，却不是輕鬆的，但是爲着興趣，我仍要不間斷的這樣維持下去。有時我遠在四川的家庭滙款不繼，我賒欠報販的報費竟達半年之久。

就在十四年的冬天，曹雲祥校長邀請北京導報的發行人克拉克先生（Mr. Clark）到清華來，在大禮堂作一小時的演講。在我個人來說，先讀他主辦的報紙，再聽他本人有關新聞問題的演講，留下的印象很深。北京導報於廿一年六月九日由中國人接辦，改名北平英文時事日報（Peiping Chronicle）。後在抗戰期中，我在成都得識中央日報社長張明煒先生，他才告訴我，他和一些朋友到北平接辦北平時事日報的情形。

民國十五年我和晨報由讀者的關係進而爲特約撰述的關係。那時著名的晨報副刊分關爲許多週刊，「國際週刊」即爲其一，由劉勉己先生主編，頗著聲譽。由一位中學同學而當時尙肄業北京法政大學的馮富康兄介紹，劉先生要我爲國際週刊翻譯一些稿件。記得每逢「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 在第二次大戰以前這個月刊在國際文化學術界的地位與「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不相上下，同具權威〕新出刊，劉勉己先生必親勾出一篇乃至兩篇文章，要我譯成中文，以備刊載。當時我擔任這項工作，

相當的吃力，遇有疑難的地方，我就去向劉師舜（琴五）和邱椿（大年）兩位老師請教。這兩位老師同是江西人，同在清華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學成同得博士學位後，同來清華任教（民十五），同住在清華工字廳單身教授臨時宿舍。琴五老師直接教授我們的外交史，現在我閉目遐思，他那用中英文講解的神態，尙能記憶如昨。我對於翻譯要是一點長進，琴五老師的實際指導的關係很大。他在外交界退休後，仍力事譯著，有「中詩百首」，及「四書道貫」的譯作問世，聲譽卓著。

大公報於民國十四年改組復刊，一開頭我就訂閱。這個報紙出版在天津，暢銷在北京，聞名於全國。這個報紙以言論著稱，在時局危疑震撼中，它一言決疑；在國人議論紛紜中，它一語定論。大公報的筆政傳統上是由張季鸞先生主持，但在他們創辦三雄中（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胡政之先生既長於經營，亦擁有如椽之筆，該報重要社論亦時出其手。胡政之先生是四川人，我中學的校長張重民先生與之交厚，此時留寓北京，亦時爲大公報撰文。吳佩孚敗於丁泗橋時，張氏曾以「跌霸」爲題，暢論戰局發展，聲聞一時。

大公報雖然主持筆政得人，仍將言論地盤公諸天下，它專闢「星期論文」版面以代

替星期日之社論地位。論文由作者署名負責，言論絕對自由。

同在這個時期，天津還出版一份有歷史的「益世報」，爲天主教會所辦。這應屬於地方報紙，在河北農村頗爲暢銷。可是民國廿一年我重到北平，「益世報」由羅隆基主筆政，在言論方面，躍躍欲試，大有要與大公報一比高下，從地方報紙走向全國報紙之勢。

自從白話文運動以迄民國廿年間，白話文尚未侵入報紙社論領域，而一種含蓄感情表現力量的新聞文言始終抗拒着白話文的應用。在我個人讀報的記憶中，純粹用白話文來寫社論，當從這個時期的「益世報」始，而是出自羅隆基的筆下。

我辦第一張報紙是在成都，時間是民國廿年冬天，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砲轟北大營造成東北事變之後，因之這一張報紙叫着「國難日報」。當時我得自一位軍人同志謝德堪先生的幫助，每月他拿出一百元大洋出來，這個報紙就辦起來了。

「國難日報」是由我負責社務，曹青萍兄任經理，總編輯則爲當時成都一位老編輯陽尚孩兄。我廿一年春離開成都，該報言論及編務完全由魏思愆兄負責，他是一個中國「才子型」的青年，可是他却把這報紙苦撐到最後。